

谁在保护纽约 不受恐怖袭击

每天早上一到办公室,柯蒂斯就会听到比夜间多3倍的危险故事。

她手中的收音机发出沉重的声音,收音机正开到纽约市警察局特别行动处的频率,另外还有一个声音播报着更为详细的情节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她转了转椅子,按下一个按钮,屏幕上数据库的资料开始闪烁;更多的细节、更多的人物、更多的线索,一名男子扬言要带锤子走进纽约市书店;图书馆门口有一个无人看管的手提箱;一个男人有自杀倾向,他可能情绪不安,他威胁要跳桥。但是,如果这个男人不是情绪不安,而是有意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当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桥上时,他的同伙就引爆隐藏在汽车中的炸弹……

一如既往,每个威胁甚至是谣言都需要回应。柯蒂斯站起来朝门外看了看,大约40名特工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更多的特工则已经两人一组穿行在纽约的大街小巷,寻找恐怖袭击的蛛丝马迹,他们随时会呼叫柯蒂斯。

柯蒂斯2009年加入FBI纽约反恐快速反应小组,她和她的小组的任务就是,不让纽约再次遭受恐怖袭击!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柯蒂斯和下属在会议室开会

办公场所 位于曼哈顿闹市区

柯蒂斯领导的反恐快速反应小组不为人知,他们隶属于FBI纽约办事处和反恐分部。纽约办事处是FBI驻美国各地56个办事处中最大的一个。由于受到太多的电视剧和电影的影响,在人们的想象中,FBI办事处里应该有一群下巴突出、西装革履的健壮男子,他们不是在追捕银行抢劫犯和连环杀人犯,就是在调查白领骗子或者恋童癖者。

但实际上,FBI纽约办事处里坐着的是50岁出头的柯蒂斯和她的小组——处理所有针对纽约的恐怖威胁的先鋒队。

丹·甘奇是柯蒂斯以前的副手,他说,在柯蒂斯2009年接手这个小组之前,他们经常被呼来唤去。

甘奇说:“小组的工作是处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件,但更多的是在恐怖威胁出现后被动反应,而不是事先就对恐怖威胁的源头进行控制。”

不过甘奇表示,现在,这个小组的主要工作已经变成了控制恐怖主义的源头。

柯蒂斯驳回了这样的恭维。她不喜欢说废话,而喜欢卷起袖子来大干一场,她的这种性格和管理倾向一般出现在30多岁的男性身上,她的手下称她为“熊妈妈”,而她则称他们为“熊仔”。

柯蒂斯小组的办公室在曼哈顿闹市区,办公室里有大约100张桌子,每张桌子都用齐胸高的隔板分隔开。桌子上放着特工的防弹衣、背包、老婆孩子的照片等物品。办公室大厅里有一个指挥椅,每逢平安夜、举行美国网球公开赛以及召开联合国大会等重要的日子,特

工们就会坐在桌子前盯着电脑,电脑中是各个摄像头传回来的监控画面。

柯蒂斯的办公室看上去有点杂乱,角落里是她的工具,其中包括两把用坏的锤子、三面磨损的防暴盾牌,还有一些长柄的锤子。靠墙放着书架,上面是成堆的文件和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写着“给黑猩猩”,黑猩猩是柯蒂斯在华盛顿工作时的外号,当时她的主要工作是反毒扫黑。墙上还挂着埃德加·胡佛1930年和克莱斯勒大厦的合影。

FBI局长罗伯特·米勒“坐”在柯蒂斯办公室的沙发上,这是什么情况?原来,有人画了一张真人大小的米勒画像,并且剪了下来放在沙发上。沙发上的“米勒”穿着FBI搞突袭时行动人员常穿的蓝色风衣,双臂交叉放在腿上。对此,柯蒂斯说:“我更希望将米勒的画像挂在墙上而不是放在沙发上,不过现在这种方式让他得到了额外的尊重。有时候他会吓到清洁工,因为熄灯之后,画像的影子映射在墙上是十分吓人的。”

柯蒂斯办公室的隔壁是一个威胁评估中心,那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面有特工全天候接听电话,将收到的可疑线索记录下来,他们的工作就是分析每一个电话,每一封电子邮件和每一张传真的严重性。

“我们是恐怖威胁的急诊室,FBI的轻装步兵,”柯蒂斯说,“一切线索首先都会被送到这里,我们的任务是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找到问题所在,我们像是在预防犯罪。我们要在事情还在酝酿期间就进行干预。”

部门职责 将恐怖袭击扼杀于摇篮中

任何时候,FBI纽约反恐分部的工都采取“开放式线索”的方式。约翰·加卡罗龙是纽约反恐分部的掌门人,按加卡罗龙的说法,柯蒂斯领导的反恐快速反应小组每年所处理的恐怖威胁难以计数。任何一次威胁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010年,由于他们的及时处置,一起将炸弹藏在打印机硒鼓里带上商用客机的阴谋没能得逞;还是由于他们的及时处理,一起网络袭击对财政系统的阴谋胎死腹中。柯蒂斯和她的组员们每天在和浩如烟海般的信息战斗,有一条信息处理不当,带来的后果就是毁灭、经济萧条或者大量人员伤亡。

加卡罗龙说:“纽约是每个恐怖分子都想袭击的目标。一切电话、电子邮件和小物件都可能是线索,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和一次荒谬的虚惊之间只有毫厘之差。

“线索可以是任何东西,”柯蒂斯说,“我们经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我的邻居凌晨3点在车库里做一些奇怪的事’。有人甚至会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说,‘我的邻居是个恐怖分子,我有证据。’我们必须对每个电话都作出回复。”

柯蒂斯说,他们接到的最尴尬的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那个女人在电话中不停抱怨自己的阴道,接电话的男组员没办法忍住不笑,他都不好意思把电话内容记录下来。直到柯蒂斯走过去下了命令,他才把这个电话的内容写了下来。

对电话的内容进行调查是很枯



FBI中女特工只占18%

燥乏味的,有时难度还很大。柯蒂斯说:“比如说,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看到一辆马自达萨塞州的汽车在拍摄乔治·华盛顿大桥的照片。但是他没看到车牌。现在我们的技术能力可以追踪这辆车,只要它经过华盛顿大桥,我们就会拍到照片。要是以前,我们只能说,‘见鬼,举报者没看到车牌!’”

如果威胁和恐怖主义有关,柯蒂斯办公室会把情况向上递交给美国国家反恐部门或国际反恐部门。在2010年《纽约时报》广场的案子中,柯蒂斯当时已经结束了白天的工作,正在吃晚饭,这时她的黑莓手机响了起来,电话传来的信息是,《纽约时报》广场出现可疑的烟火。50个小时之后,在一场涉及多个地方和联邦反恐部门的追捕行动中,美籍巴基斯坦人费萨尔·沙赫扎德在肯尼迪机场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离开美国。据沙赫扎德供述,他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停在《纽约时报》广场,准备引爆。

应该说,是柯蒂斯从不相关的事物中发现联系的能力使她成了反恐界的“明星”,但她坚持认为,是她和她的小组实事求是的精神帮助她取得了成绩。

FBI联合反恐部队的人说,柯蒂斯在根据恐怖分子的“世界观”找到犯罪线索方面很在行。

例如,联合反恐部队抓了一个人,柯蒂斯就会刨根问底:这家伙和其他事有关吗?他从哪儿来?他的世界观是什么样子呢?他的背后是谁人,我们对在其他国家生活的美国人也很关心,谁会做伤害美国人的事?



柯蒂斯和同事谈笑风生



FBI纽约反恐快速反应小组的办公室

工作方式 注重情报共享和协调

当柯蒂斯受命前来纽约时,FBI高层对她说了:“修复纽约,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柯蒂斯决定和FBI联合反恐部队共享情报。

在那之前,FBI纽约反恐快速反应小组和FBI联合反恐部队在情报交换方面时断时续。纽约市警察局和FBI更是经常在追查同一件案子却不知道分享情报。柯蒂斯很清楚地告诉她的雇员,他们是她和FBI工作的。

“我们支付你们的薪水,所以我们决定做事的方式,”柯蒂斯说,“这一点我说的很清楚。大家身上会有压力,每个人都不能犯错,因为恐怖分子就在等我们犯错。我对你们的意见很感兴趣。但是当一天结束时,如果发生任何错误,最终的负责者都是我。”

在重组了队伍之后,柯蒂斯采取了一种松散的“融合细胞”管理方式,这是向斯坦利·麦克利斯特将军学的,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使用的就是这种管理方式。在战场上,每一个“细胞”尽力搜集信息,传回数据库,然后所有“细胞”搜集到的信息会在数据库“融合”在一起,从而发现暗处有没有隐藏的敌人。现在,柯蒂斯把这一套用在了情报工作方面。举个例子,西雅图一名警察发现灌木的叶子莫名其妙地发白,于是把信息记录下来,传输到数据库中,柯蒂斯就会从数据库里发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纽约长岛,或者迈阿密。这是否意味着恐怖威胁?于是就会有特工开始打电话追问详情。

除了技术整合,柯蒂斯必须具有的更重要的能力是协调技巧,她

必须通过自己的协调让纽约市警察局、国土安全部等各个部门融洽地展开合作。很幸运,她具备这种能力,人们都喜欢为她工作。她的部下女性不多,32岁的克里斯汀·吉布尼是一个,在加入这个小组之前她是一个销售人员。吉布尼说:“当你做的事情能够激发她的兴趣时,她会像一个母亲一样在旁边鼓励你。”

第一天上班,柯蒂斯告诉吉布尼不要穿高跟鞋。她说:“你是一个FBI特工,看着电影里的那些FBI特工都是怎么做的。”当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她对一些部下说:“听着,这就是你们为什么加入FBI的原因,你们加入了与恐怖主义的战争,并参与打击最复杂的和最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这就是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那么,大家努力吧!”

抛开她的成功之处,柯蒂斯出现在这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行当里是有点反常的。FBI纽约办事处有1100多名特工,其中大约200名是女性。而FBI在世界各地总共14000名特工中,女性所占的比率是18%,大约2600人。

柯蒂斯说,没多少人愿意进入FBI工作,女性更少。因为这不是一份可以让你安身立命、成家立业的普通工作,而大部分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家庭。柯蒂斯说:“干了这份工作,就是在美国公众有需要时向他们提供帮助,那些经常向上司请假,说要去照顾孩子的人显然是不适合这份工作的,不管你是男是女。我觉得,做这份工作的人根本没有性别之分。”

训练任务 找出大楼里的可疑分子

柯蒂斯宣布,她下达了一个训练任务,让大家通过一个家伙的“不寻常”的活动,判断他是不是和“基地”组织有联系。柯蒂斯和她的手下对于他们的“目标”所知并不多。他们发现,这个家伙每天晚上穿着笨重的外套从布朗克斯区的一幢房屋里出来,可能还带着一部相机。穿外套拿相机当然构不成犯罪,但这种现象是很反常的——夜里既不是拍照片的好时机,当时的天气也不该穿那么厚的外套。

还有更奇怪的事,有人每天在固定时间给他打电话,他们显然互相知道身份,但从不说出对方的名字。柯蒂斯开始怀疑,这个匿名电话可能是个诱使FBI现身诱饵,他们的目的是观察FBI如何行事。于是柯蒂斯做出了一些不同的部署,希望能反败为胜。

行动前,柯蒂斯用拳头重重地锤了一下蓝色悍马车,对阮乐说:“祝你好运!”

阮乐,32岁,曾经是军事情报官。现在,他猛踩油门行驶在纽约的市中心。

柯蒂斯正坐在办公室里检查对讲机:“26基地呼叫26布拉德,在布拉沃3号频率。”

“我是26布拉德。”布拉德·卡彭特,39岁,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卡彭特在新泽西长大,曾经被派到华盛顿特区调查恐怖资金,也曾在波士

顿担任FBI特警指挥官,2010年调来纽约。他也驾驶着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行驶在纽约的街道上。当阮乐驾驶着悍马车呼啸经过目标建筑时,卡彭特停在一个不被注意的角落里,看看有没有人跟踪监视那辆悍马车。

在目标房屋外面,阮乐停下了蓝色悍马,发动机熄火了。

卡彭特和另一名叫做加里·巴蒂斯塔的特工溜达到目标建筑的大堂门口,巴蒂斯塔37岁,曾在西点军校受训,参加过伊拉克战争。

卡彭特从夹克口袋中掏出FBI证件出示给接待窗口后面的女人,表示要和这栋大楼的负责人谈话,女人没说一句话就从窗口消失了。

当她再度出现时,对卡彭特说他可以见大楼负责人了。

大楼负责人是一个体格魁伟的非洲裔男子,他的四周围着一堆书籍和论文。见到卡彭特他都没有离开自己的椅子。卡彭特向他礼貌地介绍了一下自己,表示自己只是想请教几个问题。卡彭特希望知道住在这栋大楼里一名形迹可疑男子的情况。

遗憾的是,卡彭特发现这个负责人对于自己楼内形迹可疑的住户一无所知。负责人解释说,大楼有将近1000个住户,他怎么可能知道谁可疑谁正常!卡彭特问楼内有没有公共网络,大楼负责人摇了摇头。

卡彭特承认:“这次行动没有得到多少想要的东西,但起码让潜在的恐怖分子知道,我们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在盯着你们。只要你们轻举妄动,我们将会找到你们,一网打尽。”

实战任务 防止波士顿爆炸案“牵连”纽约

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柯蒂斯小组必须确保纽约不会受到此类“特殊事件”的“牵连”。4月15日下午2点50分,当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时,柯蒂斯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波士顿的FBI同僚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柯蒂斯正从电视上看到马拉松比赛终点线上的人们倒在血泊之中。

虽然爆炸发生在离纽约200多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无法保证恐怖分子不会跑到纽约来。柯蒂斯立即和自己的手下开始行动,仔细搜寻波士顿街道上的每条信息,然后对比纽约街道的情况,谨防恐怖分子袭击纽约。柯蒂斯说,整整一个小时,他们连姿势都没有变换,整个人的身体都僵硬了。接着,柯蒂斯就要去参加一个三方简报会,通报对于此事的调查情况。

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柯蒂斯受到FBI高层召唤,她被要求做好坏打算。

在听说波士顿遭到攻击后,柯蒂斯说:“我首先关注的是,纽约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吗?我同样关注的是,拿出一切我们已经掌握和验证过的信息。看看是不是和波士顿这次事件有关。于是,只要是来自波士顿来的信息,不管多小,我们都会记录下来调查清楚。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忙的事。”

柯蒂斯接着解释说:“FBI有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调查波士顿马松爆炸案。当线索指引到这里时,调查组就会通知我们。比方说,调查中他们发现了一个钱包,钱包上有贝蒂·史密斯的名字,而贝蒂·史密斯来自纽约,这个信息就会传递到我

们这里。这个钱包和爆炸案有关系吗?我们将会调查贝蒂·史密斯的一切,弄清楚她和波士顿爆炸案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确实发现了蛛丝马迹,我们就会把信息反馈给波士顿的调查小组。”

不久以后,柯蒂斯很不情愿地被要求指出谁可能是波士顿马松爆炸事件的制造者,以及他们发动袭击的原因。

如果恐怖分子选定4月15日发动袭击是为了针对1775年4月15日莱克星顿的枪声和康科德战役,那也许会是一场针对整个美国的大袭击。

柯蒂斯说:“很难判断究竟是什么触动了恐怖分子的神经,让他们兴奋起来。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这个星期是特殊的日子,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可能那个星期是特殊的日子。有

时候,恐怖分子甚至会寻找两个特殊日子的连接期,以扰乱美国安全部门的视线。”

4月25日,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格说,波士顿爆炸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和焦哈尔·察尔纳耶夫曾计划在《纽约时报》广场实施第二次爆炸袭击。

彭博伯格当天在市政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焦哈尔告诉当局,纽约市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他哥哥企图开车到纽约并在《纽约时报》广场引爆炸弹。

彭博伯格说,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4日晚提供的消息,焦哈尔已经承认,兄弟两人18日晚间企图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劫夺一辆车,携炸弹从波士顿开到纽约,然后在时报广场引爆炸弹。



柯蒂斯在自己的办公室中